

寻找症结 跨越障碍达成共识

-----浅析影响中日青年相互认识的主要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室胡澎

明年是中日恢复邦交 30周年。自 1972年以来,在中日关系上发展之路上,两国老一辈政治家、民间友好人士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中日关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跨入 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看到中日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和交流。特别是伴随着交流的增进和加深,中日经济关系日趋密切,走向相互依存。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地理距离非常近,心理距离又相当远的两个国家。2000年友好交流历史与百年沉痛记忆交织,两国关系关系自建交以来友好与恶化并存。“一衣带水”、“求同存异”、“相互理解”至今仍然是双方频繁使用的词汇。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出象中国和日本这样高唱和平和友好,但又时常相互抱怨缺乏理解、难以沟通的国家了。我们经常能听到两国关系上出现许多不和谐的音符。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以反动历史观为基准的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李登辉获得日本外务省的赴日看病的签证;小泉首相将在 8月 15日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等使得本来就暗藏急流险滩的中日关系愈加险象环生。

有很多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了两国国民之间缺乏相互理解的因素。青年是当代中日关系的继承者,也是未来中日关系的构筑者。当代两国青年对中日关系的理解和思考直接影响到今后两国关系的走向。我想就当今社会影响中日两国青年的相互理解的因素进行一番思考。以期找到症结,跨越障碍,实现相互理解。

社会思潮对年轻一代思想意识的影响

一、中日两国社会思潮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思潮是一个或者多个社会阶层在一个时期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日本的社会思潮反映了一个时期的日本国民情绪,这种国民情绪对中日关系有很大影响,对日本年轻人思想的影响更为深远。冷战时期日本有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和保守主义思潮两种对立的社会思潮。保守主义思潮是指在国际社会追随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充当反共的据点,在国内坚持日美安保条约,坚持轻军事重经济发展的思潮。从 60年代到 80年代这两种社会思潮不断对立和斗争,而斗争和对立的焦点是“日美安保体制”和宪法第九条。60年代日本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80年代中曾根执政期间,保守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生长在 80年代的日本青年人深受日本不但要成为经济大国,还要成为政治大国的“大国情绪”的影响。80年代后期,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新民族主义思潮蔓延。新民族主义思潮主张要做美国的平等伙伴,要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石原慎太郎几部说“不”的著作屡印不衰,在日本国民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思想的渗透。90年代日本政界、舆论界、学术界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呈现加强的趋势。他们成立各种研究会,披着学术的外衣,具有很好的隐蔽性,很容易蒙蔽国民的眼睛,特别是年轻人很容易接受这种观点影响。9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上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在日本国民间产生广泛的影响。他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了“普通国家论”,他认为日本应该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改变在国际社会处处受限制

的局面。新保守主义主张应给宪法以新的解释，并且认为日本已经成为可以参与行使国际性军事力量活动的大国了。有修改第九条内容、实现向国外派兵、使自卫队合宪等步骤进一步向修宪推进的企图。在研究日本当代社会思潮问题上，中国学者见解纷呈。有人认为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依然是和平民主主义占主流。也有人认为是民族主义占主流。我认为针对日本普通民众而言，和平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分。例如，希望日本走一条“普通国家”之路，赞成修改宪法的国民有相当一部分是爱好和平、厌恶战争、有反战思想的。可以说由于媒体的导向，越来越多的国民趋向于接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并且这一部分接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国民的年龄趋于年轻化。具体到中日关系上，由于近一、二十年忽视了对中日友好接班人的培养，使得中日友好的人才有些青黄不接。象日中友好协会等对中国友好的团体的成员年龄偏大，他们的声音也逐渐微弱起来，渐渐退出了日本舆论的主流。那些有着偏右和右的思想的人年龄都比较轻，又占据着相当数量的舆论阵地，这批人的思想言论及在日本社会的影响，我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及时抓住机遇，将自己融入国际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使得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提高，中国以大国的姿态出现在亚洲和世界。摆脱了贫穷的中国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走改革开放之路，期望国家更为富强是中国国民的普遍心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意识增强、爱国主义高昂。但也有一小部分中国人产生了大国意识和极端爱国主义思想。在对日关系上这种大国意识和民族情结更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渲染。例如，有人看到日本近十年经济不振就不再把日本放在眼里，过于盲目自大，认为日本很快就会衰亡，认为中国会很快超过日本。由于有着近代历史上民族的屈辱的记忆，以及近年来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右倾化倾向，右翼势力活动猖獗，时常有右翼政治家散布有损中日关系的言论，再加上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使中日关系的天空时常阴云密布。这些无疑是在中国民众还未愈合的伤口上撒了盐。一些中国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对日问题上日趋情绪化，缺乏冷静克制。表现在因特网的自由论坛上，一有日本政治家刺激中国国民感情的“失言”，和诸如教科书事件等发生，就会引来潮水般批判日本的文章。

二、媒体存在的问题

社会思潮一般来说是通过各种媒体作为载体来表现出来的。当代社会报纸、广播、电视、广告、杂志等构成了覆盖整个社会的立体网络。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民的思想情绪，同时又对国民的思想情绪具有导向性。

90 年代的日本媒体相比于 80 年代呈现总体保守化、右倾化的倾向。日本各种媒体在对外关系、国家战略特别是有关中日关系上，政治的差距呈逐渐缩小的趋势。特别是在中国的报道上，媒体基本上都是负面报道多，正面报道少，并且也不够客观。例如，1992 年前后面对改革开放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日本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日本不少政治家和学者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领土政策可能会导致亚太地区的不稳定。《诸君》杂志曾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助长了中国威胁论，特别是对日本青年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象石原慎太郎这样有着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把持着日本主要几家的新闻、杂志、电视。观点右倾的各界精英的言论和著作对舆论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导向作用。他们利用舆论阵地向广大日本国民灌输他们的主张，直接影响了日本年轻一代的思想。

在中日关系上构成纷扰的台湾问题也由于媒体的导向而愈加右倾。近年来日本国内支持台独或“一中一台”的亲台势力较为活跃。不少政界人士主张日本政府应加强与台湾的交流。右翼团体一直在为李登辉访日而积极准备着。媒体一直为此大造声势，曾批评日本政府过分注意中国的态度，外交上是“弱腰外交”。此次日本政府发给李登辉赴日看病的签证前

后日本媒体更是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大张旗鼓的宣传。许多国民特别是年轻人由于对台湾历史问题不清楚，又深受媒体的影响，认为李登辉是一介平民，日本政府没有理由不发签证。认为中国政府反对是干涉日本内政。这种想法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国民情绪与媒体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造成了如果不发给李登辉签证日本政府就无法向日本国民交代的社会氛围。

历史教育问题及两国青年价值观的差异

一、中日两国历史教育

日本的历史教育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中学在进行历史课教学中，常常是把古代、近代部分拉得很长，现代史往往还没有讲就学期结束了。在日本的历史教育中“皇国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仍然占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近些年一些极右学者、政治家到处散布“皇国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等错误的历史观，使年轻人深受其害。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南京大屠杀，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言行，更使得本来就不太了解近现代史的日本学生不能够真正了解历史的真相，不能正确认识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给那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相当一部分日本年轻人认为日本在二战时是受害国，只知道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但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会投放原子弹。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正确的认识。日本有不少年轻人到了中国，参观了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感到才第一次了解了那段历史。

日本历史上从 50 年代至今的三次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事件的高潮正说明了日本历史教育存在的误区。不少右翼人士认为原有教科书里有许多日本的阴暗面，会对日本年轻一代起不良作用，令日本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缺乏热爱和没有民族自豪感。有三种势力一直在为新的历史教科书的出台而不遗余力地奔走着。一是日本政界美化战争，篡改教科书的势力；二是以“新的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为代表的右倾知识分子；三是右翼媒体和右翼团体。他们散布的对战争的反动认识对青年产生很坏的影响。在这种历史观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人很难能正确认识历史。使之在中日关系由于历史问题产生隔阂的时候产生抵触情绪。也有年轻人认为即便是侵略战争，但那是自己祖父一辈的事，战争已经过去了 50 多年，为什么现在还让他们来反省、认罪。

正如日本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的战争责任、加害者责任的暧昧化造成了只以为自己是牺牲者、受害者的国民心理；而作为对近邻各国的加害者，虽然有逃脱不了的重责，但正视它的态度受到了弱化。”¹日本历史教育的误区，以及为侵略战争翻案不仅对当代的日本年轻一代构成影响，也将影响日本将来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对青少年进行的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做为一件重要的事来抓。正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那段屈辱的历史。在对青少年教育时的主导思想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用“落后就要挨打”激励青年一代为国家的振兴而学习。在许多地方都建有抗日战争纪念馆，纪念碑等。同时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涌现出许多志士仁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学艺术创作丰富的源泉。中国青少年从小接受大量的历史教育，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都有所了解。因此两国历史教育的差异导致在历史问题上出现隔阂。日本极右势力否认、美化侵略战争是中国年轻一代不能接受的。

历史认识问题的差异成为中日两国青年交流的障碍。日方应认识到对青年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否则，日本年轻一代在同中国，乃至同被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青年交往中会处于越来越孤立的地位。

二、日本青年的价值观问题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民的目标是脱亚入欧，追赶英美等西方先进国家。二战后依然贯彻执行

的是这一国家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校教育上实行整齐划一的一个模式的教育，缺乏个性教育和价值观教育。90年代日本国民的双重价值观已较为普遍，价值观的匮乏也为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提供了土壤。

日本 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是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物质生活极大富足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被称为“新人类”。70、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又被称为“新新人类”。他们的价值观完全不同于被称为“团块一代”的他们的父辈。对日本青年一代价值观的研究应该是我们日本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世界多极化、国际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日本青年一代价值观念发生很大变化。首先是国家概念的消失。在他们身上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日趋淡漠，出现了对政治冷淡，远离政治的倾向。缺乏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关心国家发展目标，国民经济等。在 1994年中、日、韩三国调查中，有一项关于自己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是什么的调查。列举了家庭、工作岗位、社区、市镇、国家、世界等选项。在有关国家的回答中，中国有 48.3%的青年认为自己同国家关系密切，而日本仅有 10.0%的人认为自己同国家关系密切。21999年日本《国旗》、《国歌》法案在国会通过，无论日本政府和日本老年一代如何强调国歌和国旗的重要，日本年轻人仍对“国家”不感兴趣。据《读卖新闻》1999年 1月 3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61.5%的青年对政治不关心。表现之一就是选举不感兴趣。价值观的匮乏，独立、自由的生活方式带来年轻一代的空虚。使得他们缺乏判断力。容易受到误导。日本青年在政治上是“沉默”的一代。有相当数量的日本青年对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取消第九条表示不关心。然而我们也看到这一代年轻人在政治上“失声”也相当危险，沉默对右倾化的思潮是极大的纵容。

其次是自我意识的膨胀。当日本当代青年抛弃他们父辈最为看重的“国家”、“集体”“企业”、“公司”、“他人”时，对他们来说“个人”、“自我”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膨胀。追求个性化的生活。他们满足现状，安于享受，关心的是工作、家庭、个人爱好，在个人生活中寻找自身价值，令日本的老一代忧心忡忡。1991年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所著的《“认真”的崩溃》，以大量社会调查为基础，论述了认真精神在日本青年人中的崩溃。新一代日本人完全没有了老一代日本人的奋斗精神，他们只考虑自己，贪图享受，不考虑国家民族之事。

现在有些中国的学者和外国的学者担心日本复活军国主义，那么日本现在的年轻人对日本国家的发展和对战争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据 1997年中日两国青年进行的对国家目标的调查结果表明，在 6个提案（没有战争、和平安定的国家；人民生活富裕的国家；没有犯罪、没有贪污的国家；重视艺术、重视文化的国家；重视自然环境的国家；得到社会信任的国家）中，中国青年选择的最多的是希望未来的中国是“人民生活富裕的国家”，占 26.2% 日本青年第一位的选择是“没有战争，和平安定的国家”，占 33.9%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的青年一代生长于改革开放年代，了解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对中国的期望是更加繁荣富强。这里看不到日本媒体所宣传的那种中国威胁论和中国不稳定因素。而我们也欣慰地看到尽管右翼集团篡改歪曲历史，拒绝对日本的战争行径进行反省，但日本的年轻一代是热爱和平，厌恶战争的。

对增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理解的几点思考

在跨入 21世纪的今天，中日两国青年互相不了解对方国，对对方国家缺乏基本的认识甚至误解的状况远远背离了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的要求。如何增进两国青年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扩大交流的渠道。

两国青年的交流有政府间交流和民间交流两种。政府间的交流，是国家之间交流的一条主渠道。其中有公派留学、出访等。目前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区域性经贸交往愈加活跃。青年政治家的交流也是建立稳固的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青年政治家通过经常的会面和交流，建立起个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信赖可以消除许多误解和摩擦，特别是在两国关系发生突发事件或恶化时，能迅速沟通、消除误解、改善关系。民间交流有市民交流、地方政府交流、商务交流、留学交流和旅游的交流等。这些交流象无数纵横编织的网，密切着两国国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也是两国友好关系最具实质性的和最基础的。只有政府间的交流而没有民间的交流不是真正的交流，达不到真正的友好。民间交流的主力军是活跃在各个领域里的年轻人。2000年日本开放了向中国公民团体因私旅游市场，一批批中国公民（以年轻人占大多数）自费来到了这个对他们来讲既是邻邦又深感陌生的国度。为了配合这块新的旅游市场，在中国各个报纸、杂志、电视上日本风景名胜，文化习俗的介绍比比皆是。我想日方开放中国公民团体旅游市场在中日关系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第一批中国游客到达日本时，日本各大新闻媒体都寄予了关注，进行了报道和采访。日本有专家分析，逐步富裕起来了的中国公民在日本旅游、购物不但将给一直低迷的日本经济，特别是旅游业和商业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给日本的国民提供了认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机会。中国公民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这个国家，从而扩大了认识日本、了解日本的途径。

二）发挥文化的功能和文化人的作用影响青年一代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曾引起各国理论界的争议。亨氏的观点自然有不少需要商榷的地方。但他将日本和中国作为日本文明和中华文明来进行划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和日本这两种文化的思考。中日两国文化在历史上尽管有过密切交往和融合，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的确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是两国年轻人交往过程中造成误解的原因之一。这就需要首先要对对方国家的文化感兴趣。其次是以虚心的态度学习对方国家的文化，了解对方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国民性、国民思维方式以及国民感情。

在当代中日两国青年之间有这样奇怪的现象。双方都普遍对对方国家缺乏兴趣，不够了解，但同时都对另一个国家——美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其中固然有经济的因素，但文化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中日应看到美国一直致力于向别的国家宣传自己的文化，向世界上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们渗透美国人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遍布世界各地的麦当劳、上映于各国影院的好莱坞大片等都表明美国文化在宣传自己国家，使别国国民对自己国家产生兴趣上所发挥的强大魅力和所占有的分量。

在发展中日关系上，文化的功能不容忽视。回顾被称为“蜜月期”的80年代中日关系，不难看出文化在促进中日关系上所起的作用。80年代中国引进了大量日本电影和电视连续剧，深受观众的欢迎，影视作品向中国国民展示了一个经济高度发达，重视礼节又不乏人情味的国家。电视剧引起了80年代中国的“日本热”。90年代尽管日本电视报道中国负面节目较多，但还是有一些片子客观介绍了当代中国的变化，如日本NHK拍摄的《12亿人口的中国》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日本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响。风光人情的记录片《长江三日》通过在三峡游船及岸上的连续三天的现场实况转播，为日本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所著的反映日本残留孤儿的小说《大地之子》由中日合拍成电视剧在日本电视台曾多次播放，不少日本人通过电视剧了解中国人的善良和朴实，并深受感动。由此可见文化在沟通两国国民感情，增进双方了解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客观公正地介绍对方国家，特别是对对方国家的社会、文化、风土、国民生活等需要一批了解和熟悉中日两国文化的文人、学者，他们是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

日本的报纸和杂志有不少辟有大学教授、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文化艺术界人士的专栏。他们在报纸、杂志上面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想法。他们的思想直接对国民的思想情绪构成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读者构成很大影响。我们应该看到石原慎太郎之所以能当选东京都知事，并在日本国民中占据较高的支持率，除了他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有一定的市场，他个人性格中发言直率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出身于文化人的身份。这一文化人的身份使他不同于那些纯粹的政客，更能取得国民的信任和支持。

我们经常会感叹日本右倾思想的人把持媒体，对中国负面报道多，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我想其中一条是中国方面应积极发挥文化的作用，联系一批对中国友好的文人，既要联系老朋友又要发展新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文化界人士。多与他们交往，利用各种机会，如国际会议、合作考察、共同研究、合作拍片等邀请他们来中国，认识了解中国。他们回去后所写的文章必然有对当代中国的介绍，他们的声音逐步增高，使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听到对中国的除负面报道之外另一种不同的声音，有利于日本国民客观了解中国。同时，文化还能起到外交上润滑剂的作用，当中日关系出现摩擦时，文化的力量有助于解决中日关系中的棘手问题。

年轻人在电视的观众中所占比例高，因此电视文化对年轻人的影响巨大。近年来中国翻译引进的日本青春偶像剧有了大幅度增加，吸引了不少中国年轻人。日本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审美情趣都在悄悄影响着中国更为年轻一代的人。日本的音乐，特别是流行音乐早已跨越了国界，为中国青年人熟悉。相信随着文化交流的增进，中日两国青年会逐步消除隔阂，增进认识和感情。

在 21 世纪的今天，在探讨中日关系时越来越趋向于将中日关系放到东亚、放到亚太地区去进行综合考虑。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但对中日两国，对亚洲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继承和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大业中日两国年轻一代肩负重任。我们期待当代中日两国青年由陌生走向了解和熟悉，由反感逐步转为好感，能够正确客观地认识对方国家，只有这样中日关系的未来才会充满光明。

参考书目：

《日本新保守主义》浅井基文 著 新华出版社 1999年 1月

《21世纪日本沉浮辨》蒋立峰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3月

《中日青年生活观比较》何培忠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年 9月

《“认真”的崩溃》千石保著 199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第二次中日青年论坛 ---日本当代社会思潮》论文集